

東方論述與當代西方女性書寫：

莒哈絲、桑塔格與湯亭亭的中國想像

黃心雅（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

做為意識型態和實踐方式的東方論述，據薩伊德（Edward Said）指出，是涵蓋三個互相重疊的領域，一是歐美和亞洲間不斷變動的歷史與文化關係；二是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研究東方文化傳統的學科；三是一個現今西方世界，基於其政治上的急迫性，稱之為東方的區域，以及和其相關的意識型態、假設和想像。東方論的這三個層面間的共通點在於那條分隔東方和西方的界線，與其說分界是自然的事實，不如說是人為的虛構，薩伊德稱之為想像的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y）。實則，在東方論述的操作下，東方的真實性被僵化成古老的原型，東方淪為據以鞏固西方殖民自我（colonial Self）的沉默他者（the silenced Other）。本論文由東方主義出發，鋪陳當代西方女性書寫如何援引、挪用東方論述的精神，以女性他者（female Other）凌駕種族他者（racial Other），生產女性東方主義的文本。薩伊德曾指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本身是個全然男性的領域，顯然薩氏忽略了帝國主義的女性觀點。由法國作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自傳小說《情人》（*L'Amant*）、美國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中國之旅〉（*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以及華美作家湯亭亭的《中國男人》（*China Men*）中，本論文試圖探究西方女性文本裡的中國符號及想像，以作為薩氏《東方論》的補充篇。

關鍵詞：東方主義、當代西方女性書寫、中國想像

收稿日期：90.09.04；定稿日期：90.12.28

薩伊德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一書於一九七八年問世，在學院內外產生廣泛的回響，如今儼然成為後殖民論述和文化研究的經典名作。¹ 如薩氏在〈東方主義再思〉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一文中歸結，做為思想和實踐方式的東方主義，是涵蓋三個互相重疊的領域：

一是歐美和亞洲間不斷變動的歷史與文化關係；二是西方一門自十九世紀以來研究東方文化傳統的學科；三是一個現今西方世界，基於其政治上的急迫性與重要性，稱之為東方的區域，以及和其相關的意識假設、意象和想像。
(1986: 211)

東方論述這三個層面間的共通點，在於那條分隔東方和西方的界線：與其說分界是自然的事實，不如說是人為的虛構，薩伊德稱之為「想像的地理」 ("imaginative geography") (1986: 11)。《東方主義》一書，援引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論述，以揭露知識論述和權力運作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西方的優勢霸權，即是建立

1 關於 *Orientalism* 一書的譯名，單德興有專文評論。見〈理論之旅行／翻譯〉。*Orientalism* 或譯為「東方學」、「東方論」或為「東方研究」、「東方主義」，各有所據。「東方主義」是學界習慣（惰性？）的譯法，但此譯名只包含了 *Orientalism* 的部份含義，（「主義」一指學術研究學科，一指思維方式）。薩氏之著，主旨在揭露傳統東方學研究中的權力論述及其運作機制，因此，*Orientalism* 作為一種權力論述 (discourse)，遠比其作為一種主義或意識形態 (ideology) 來得重要（單德興，2000b: 53-56）。本文以通行的「東方主義」和「東方論述」交替使用，不涉翻譯策略的論辯，也藉此強調 *Orientalism* 豐富的文化意涵和多面向。

在知識／權力體系上。因此，所謂「東方」，是西方權力知識的霸權力量所構築的「一套再現系統，是西方學術、西方意識和西方帝國的一部分」（Said, 1978: 202-03），絕非東方的真實再現。歐洲中心論的帝國主義，以知識權力的優勢，將東方異化為「他者」（Other），旨在鞏固其殖民的「自我」認同（Self）。東方主義以歐洲自我相對於東方／他者所展現的文化霸權，如薩氏所言，可類比到當代文化底層，在性別和種族上不平等的情況，如女性主義者和黑人文化研究者所控訴的相似。薩氏並以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主婦類比東方人，說明其挑戰東方論述的後殖民研究和女性主義的關連：父系制度下的女人是男性觀點的沉默他者，如同東方是帝國霸權下無聲的客體（1986: 220-26）。也因此緣故，薩氏強調「東方主義」是個全然男性的領域（exclusively male province），女人只是男性權力／想像的產物而已（1978: 207）。於此，薩氏顯然沒有超越性別二元對立的謬誤，更忽略了女性在文化帝國主義裡所扮演的角色。東方主義和性別的關係為何？這是薩氏《東方主義》一書略去未談的問題。² 本文以薩氏「東方主義」的概念為本，針對上述質疑

2 薩氏不僅略去性別（gender/sex）問題，也漠視其書中同／異性戀（homo/hetero sexuality）的弔詭。薩氏所列的東方主義作家波頓（Richard Burton）、勞倫斯（T.E. Laurence）、佛斯特（E.M. Foster）、王爾德（Oscar Wilde）等多人不僅旅行東方，更是著名的同性戀者。因而，東方成為同性戀情慾的烏托邦，是禁忌慾望投射與操練的場域。性別及同性戀性議題為薩氏略去（"sexual promise (and threat), ...not the province of my analysis here" 1978: 188），致使東方研究，重蹈帝國主義男性／異性戀中心的主流論述邏輯。參閱 Hastings（1992）。此外，*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的中譯本《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以毛澤東「用詭異的女性眼神看著我」等驚動之字眼為封面，充滿同性戀想像，引起讀者注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被女性化以及西方凝視所透露的同性戀幻想，應為東方論述的重要議題。

加以延伸，以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桑塔格（Susan Sontag）和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等當代西方女性文本中的「中國想像」為例，³ 探討東方論述的性別意涵。主旨在嘗試彌補薩氏《東方主義》之缺（fill the lack），解讀西方女性文本中轉化「中土」為「異域邊陲」的「女性東方主義」。

一、東方主義、中國想像

如薩伊德所言，約自十八世紀末當東方以遠古、遙遠、富饒之姿，再度被歐洲發現時，東方的歷史即成為「古老」和「奇特」的典型—是一段歐洲因本身工業、經濟和文化的進步發展，可將其遠遠拋諸腦後的歷史（1986: 215）。此後，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共謀下，東方在實際政治世界中的對應物是歐洲在東方殖民的搜括所得，是殖民獲取物的代號；不是歐洲的對話者，而是其相對沈默的他者（silent Other），以助歐洲定義「自我」。此宰制、重塑東方的西式杜撰（Western invention）謂「東方論述」（1978: 1-3）。在此東方論述的操作下，東方的真實性就此被僵化成古老的典型（stereotype）。關於「典型」一詞，最早為立普曼（Walter Lippmann）引用（1922），在社會學上有如下的四項認定；典型是

3 文本論證的重要性為薩伊德肯定。薩氏以「論述」的角度闡述文學生產，認為文本具「俗世性」（worldliness），與歷史環境息息相關：「文本確實是社會與人類生活的一部份，是時代的一部份，是詮釋時代的依據」（1983: 4）。文字的詮釋和分析，應放置於歷史和社會的情境中（histor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文本和情境（text and context）、文學和歷史、文化與社會是密不可分的。

簡化非繁複的；繆誤非真確的；來自二手而非實際經驗的真實再現；無法隨著新的經驗變革和修正的（qtd. in Lin, 1988: 79）。誠然，在東方論述的文化霸權下，東方被形塑成一個簡化、非真實、固著的典型：東方常被描繪成陰柔的、富饒易孕的，其象徵常是淫逸女子和後宮粉黛，這種將東方女性化和性慾化，俾進而將其異他化，有如同男性霸權和父權體制相類似的作為（Said, 1986: 225-26）。因而，「東方是個虛構的地方，其本質為空無，正與女人靜默的空間相對應」。⁴易言之，只有在「東方」（女人）被他者化（邊陲化）後，「西方」（男性）始可界定自身為中心。西方對東方的凝視，本非關愛的眼神，充其量東方只是提供一套可供操弄並全然迥異的象徵符號。西方即藉由對東方的想像／區隔／再現，以遂其殖民宰制的政治企圖（Said, 1978: 3）。

如上述薩氏以阿拉伯世界的經驗對「東方論述」的闡釋適用但卻不能涵蓋西方的「中國想像」。薩氏筆下的東方，直指阿拉伯及回教世界，《東方主義》書中，提及「中國」不下二十次，但卻是個薩氏無力論述的魅影。「中國」——西方人稱「大汗帝國」（the Chan's great empire）——是如何被西方帝國主義異化為沉默的他者？薩氏在控訴西方帝國主義將「東方」化約時，以回教世界為「東方」代言，未能慮及東西方複雜、多面向互動的歷史脈絡，誠然是另一種化約。⁵其實，在遠早於哥倫布地理大發現的年代，十三世紀

4 Linda Peckham, *Not Speaking with Language/Speaking with No Language*, qtd. in 張小虹 (1995)。張文前，以默汗蒂 (Ghadara Talpada Mohanty)、巴特 (Roland Barthes) 和派肯 (Linda Peckham) 的三段引文，界定西方的「東方想像」，有開宗明義的效果。

中國蒙古王朝橫跨亞歐，加上十字軍東征的宗教狂熱，中西交流已逐漸成形。此後，中國儼然成為西方的參考地標。密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亞當自樂園的高山遠眺：

全盛的帝國，始於

汗八里（*Cambalu*）的城牆—中土大汗的轄地，

……

蜿蜒至帕金（*Paquin*），中國王的領土。（*Paradise Lost Book XI. ll. 387-90*）

- 5 在〈東方主義再思〉文末，薩氏列舉其他挑戰東方論述的作品，也提及對日本、印度、中國文化重新檢視的成果：「如正雄三吉（Masos Mijoshi 1960）、阿瑪德（Eqbal Ahmad）、阿里（Tariq Ali）、薩帕（Romila Thapar 1975, 1978）、古哈團隊（Ranajit Guha）（下層研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 1982, 1985）、年輕學者如巴巴（Homi Bhabha 1984, 1985）、米特（Partha Mitter）」（227）。但值得一提的是，對中國有深入研究的漢學家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卻不在名單中。史氏《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阮叔梅譯，台灣商務印書，2000），蒐羅西方從十三世紀到二十世紀八百多年來對中國的記錄、幻想、洞見與偏見，實為見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美國耶魯大學當前最叫座的課程之一即是史氏開設的中國近代史，西方國家對中國研究興趣之濃厚可見一斑。國內輔仁大學英研所教授康士林（Nicholas Loss）的《美好仙境》（*The Best and Fairest Land*），論述中古歐洲文獻中的中國意象，緒論一章概述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參考著作。另外，2000年七月號《中外文學》為探討「中國符號」的專刊收錄關於「西方中國想像」的數篇論作。反向來說，中國人眼中的西方也是近年來中國學者研究的課題，中國大陸學者鍾叔河編纂《走向世界叢書》，包含《歐美環游記》、《西洋雜誌》、《隨使法國記》、《倫敦巴黎日記》、《歐洲十一國游記二種》等部，再現中國人眼中的西方。陳曉梅（Chen Xiaomei）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 Mao China*）將西方異他化（Western Other），可謂「東方主義」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

亞當登高遠眺，以此「君臨天下」的觀看角度，如同收納東方帝國於西方的版圖，密爾頓或無宰制中土的政治企圖，但以中國帝國標示地理方位，做全景式的審視，俾鞏固神的主宰，突顯西方基督教王國的至高無上，是《失樂園》的書寫策略。明顯的，汗八里是中國北方之都，而帕金亦即北京，亞當的目光其實一直在同一個城市裡逡巡，如何能蜿蜒、統馭中土？西方對中國的確實位置及歷史，缺乏明確概念，可見一斑。但是，凝視者才是全景的中心，是意義、秩序和價值的賦予者，亞當眼下的「浩瀚異域」非關真實地理，而是西方觀看中華帝國的「典型」，或借用巴巴（Homi Bhabha）的話，是一種「凝注（arrested/fixated）的再現形式」（1983:27）。巴巴認為「典型」所展現的是極度矛盾的情結：包含「投射（出）和投入（projection and intrajection）雙重的潛意識作用，既是隱喻也是轉喻的策略，涵蓋置換、罪惡感、攻擊慾；是表顯與內抑知識的分裂和其掩飾」（1983:34）。誠然，中國帝國的典型透露西方分裂的自我，既是「罪惡感」的自卑又有「攻擊慾」的自大。亞當登高正值其因犯下的「原罪」為上帝逐出樂園之際，神以宇宙全觀的視野，展示人類未來的希望。套用巴巴的話，中華帝國為西方基督徒的「罪惡感」的投射，淪落的悲哀似乎在帝國強盛的「典型」中找到慰藉／置換；以「凝視」（gaze）作為「統馭」，⁶收納帝國於未來的版圖是攻擊慾的表徵，如此一來（西方）樂園之失則為（東方）樂園之得（gain）。《失樂園》創造中國異域，實則鞏固了「內在、自我主體的地位」（"an inside, its own subject status"）；

6 個中表現，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全敞景式監獄中央的控制台（Panoptican），觀看者以優勢的位置將四方景物一覽無遺。

Spivak, 1988: 293)。

中國的古文明和強盛為西方凝注，造就 Cathay 成為西方文本的關鍵字彙。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在一六九九年編輯的《中國近訊》 (*Latest News from China*) 的序言中指稱，十七世紀末，最高度教化和最有品味的人，都集中在「兩個大陸上」，亦即中國和歐洲。只要這兩塊距離遙遠而高度文明土地上的人願意彼此攜手，俾「澤被中間地帶的人」，則「人間天堂」就有降臨的一天。儘管萊氏近乎「世界大同」的想像難能成真，中國文化卻已溶入歐洲生活，中國的異域 (exotic) 風味深深吸引西方人，成為所謂的「中國風」 (Chinoiserie)。從未涉足中國的西方大思想家如萊布尼茲、孟德斯鳩 (Montesquieu)、伏爾泰 (Voltaire) 等人，從可得的史料中，以自我觀點創造論述體系，再現他們「理解」 (虛構) 的中國。中國在西方引起的強烈情感和樂趣，足見其魅力，卻也在「西洋鏡」的折射下失真，成為一個營造和定義西方文化的魅影 (phantom)。⁷

中國為盛世文明的意象，在十八世紀末西方殖民主義之起，便告終結。中國的停滯不前成為列強收編、殖民中國的最佳憑藉，對西方歷史學家如赫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而言，中國就像「一具木乃伊，以絲布包裹，外表畫著象形字」。⁸ 赫德以埃及木乃伊的死亡意象，再現中國，將歐洲以外的兩大古文明一網打盡。中國和埃及迥異的文化和歷史脈絡，在西方人眼中，實無二致，不過是應化為歷史灰燼並拋諸腦後的古文明而已。中國人「註定生生世

7 參照史景遷第五章「啓蒙時代」，中譯 107-130。章中史氏細述萊布尼茲、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人作品中的中國意象及觀照。

世要賴在同一塊土地上」，即便有心，「也成不了希臘人或羅馬人。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生來就是小眼睛、短鼻子、扁額頭、少鬍子……」。⁹赫德之說乃生物決定論，以容貌區隔中國人及歐洲人，以歐洲單一的審美觀審視中國人，將其異他化為次級生物，「少鬍子」一語將中國人去男性化（emasculated），以此將其去勢（castrated），故而中國人註定無法成就如希臘羅馬的輝煌文明。中國由「世界大同」（wholeness）的動力成為「異域」（otherness），是「世界」（The West is the World）的邊陲，無法進入世界歷史。

但中國沒有也無法「賴在同一塊土地上」。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列強環伺，中國政治腐敗、門戶洞開、割地賠款。¹⁰數以萬計安土重遷的中國人，遠渡重洋，至「美麗新世界」（American as Beautiful Nation）尋覓金山，開始漂泊離散的生活。關於「離散」（diaspora）一詞，格洛伊（Paul Gilroy）稱為「走避暴力、威脅」的經驗，絕非自由意志選擇的時空置換（1997: 318）；所謂「離散意識」便是自我認同危機的根源，離開故國等同拔根，「存在」就受到威脅，如盧梭（Rousseau）云，「當人不再擁有祖國，也就不

8 Herder (1800),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 (London), p. 296. 引自史作中譯 125。

9 Herder 293. 引自史作中譯 125。

10 不僅西方列強殖民中國，東方日、俄霸權也在中國佔有領土，此乃薩氏「東方主義」那條分隔東、西的想像界線所沒有詮釋的殖民現象。中國淪為次等殖民奴之實，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是萬劫不復的宿命。2000年十一月中，法國巴黎公演一齣名為「禁止華人與狗」的話劇，引爆種族議題，文化帝國主義之實，似無法以所謂「舊中國時代」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的侮辱一語帶過。詳見2000年十一月十八日聯合報十三版。

再存在」(When he has ceased to have a fatherland, he no longer exists)。¹¹ 然而，中國人的認同危機更涉及沈默／禁聲(silence/silenced)和西方「中國想像」對中國人的宰制。值無數華工移民美國西岸之際，沙克羅莫(Sax Rohmer)於一九一〇年代創造「傅滿洲」，轉化中國人的聰明機巧為邪惡的象徵，正體現西方對「黃禍」(Yellow Peril)的焦慮：無論是起因於馬可波羅時期的蒙古西征，或近代的義和團之亂，或大量的華工移民，西方人始終活在「黃色帝國」的恐懼下。傅滿洲「如撒旦的臉龐，有雙綠眼，散發如貓眼的磁力，此人集東方人的冷酷和心機於一身」，著實是「黃禍的化身」。¹² 或者，如趙健秀(Frank Chin)指出，傅滿洲對西方或不構成威脅(threat)，而是冒犯(offense)：「傅滿洲的邪惡，不僅是性的(sexual)且是同性戀的(homosexual)……身著長袍，眨著眼睫毛……不時以長指甲撫觸白人的腿、腰和臉頰，無非是對白人的男性雄風輕浮的挑逗」。¹³ 無怪乎華裔文評家如趙健秀、陳耀光(Jeffrey Paul Chan)等人聲稱：西方「典型」的「中國人絕非男人，亞裔之女性化，全無傳統男性的創意、膽識、體力和創造力，足以令人噁心厭棄」(Chin, 1983: xxxi)。¹⁴ 至此，中國在西方文化

11 Rousseau, J. J. (1953) Considerations on the Government of Poland, in. F. Watkins (Trans. And ed.), *Rousseau: Political Writing*. Edinburgh: Nelson Sons. Qtd. in Gilroy (1997: 301).

12 Sex Romer, (1916) *The Return of Dr. Fu Manchu* (New York: Mckinley, Stone, and Mackenzie), p.7, qtd. in. Mao-Chu Lin (1988: 97)。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稱中國人為「不老實」("perfidious", 1978: 108)，足見中國人「富心機」的典型，根深柢固。關於華人在美國文學和文化中的形象，參見 Lin。

13 Frank Chin. (1972) Confessims of the Chinatown Cowbo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 4.3:66, qta. in Cheung (1990: 236)。

霸權的再現下，除了專制帝王、辮子和纏足外，¹⁵ 尚有遭「閹割」（castrated）的中國男人。

二、當代西方女性書寫的中國想像

西方「傅滿洲」的想像，印證薩伊德所言：「東方和性（sex）有著千篇一律、一成不變的關連」（1978: 188）。實則，薩氏以福樓拜（Flaubert）和埃及藝妓的性關係，闡釋東方論述如父系霸權的本質：

她（藝妓）從未為己發聲，從未表達情感，從未存在或擁有歷史。他（福樓拜）為她發聲、再現她。他是西方人、男性且多金，這些都是構成宰制（domination）的歷史事實，足使他不僅擁有她的身體，並擁有陳述她的故事的權力，告訴讀者何謂「典型的東方人」。（1978: 6）

以藝妓為東方的替身，將東方女性化，不僅充滿性和性別階級（sexual/gender hierarchy）權力運作的想像，更是薩氏以性別差異

-
- 14 其他中國人的「典型」，如陳查理（Charlie Chen）以及近來流行的網路動畫主角「王先生」（Mr. Wong），雖不如傅滿洲的「華麗優雅」，卻依舊再現中國人「女性化」的形象。參照 Lin（1988: 97-103）；"Mr. Wong" on "icebox.com".
 - 15 哈金一九九九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得獎之作《等待》，即因其封面被詮釋為代表清朝帝制餘毒的辮子，內容並涉及女子纏足，中國北京出版社以哈金迎合西方口味為由，取消其中文版的出版計畫。詳見本年九月十二日《中國時報》陳文芬專訪。

(sexual/gender differences) 勾勒種族差異 (racial difference) 的論述策略。顯然，薩氏的基本假設是書寫／再現東方為男性的特權：

每個書寫東方的人必須面對「他」的東方，將東方譯入「他」的文本，選擇「他」的敘述口吻／架構／意象／主題，凡此種種旨在告訴讀者，「他」圍堵／統御東方以及再現東方的意圖。(1978: 20)

薩氏以男性「他」代表「每個人」(everyone)，旨在揭露東方論述乃建構於陽具中心論 (phallocentrism)，東方論述將東方／女人加以異他化的種族／性別歧視的基調，應為女性主義同聲撻伐。至此，薩氏將東方主義視為男性論述，漠視女性參與建構西方文化帝國的可能，在《東方主義》索引超過九百個引述項目中，僅出現七位女性的姓名，更遑論要觸及十九世紀以降如金絲黎 (Mary Kingsley)、妮爾 (Alexandra David-Neel)、瑪莎雀麗 (Nina Mazuchelli)、瑪汀諾 (Harriet Martineau) 等多位女性旅行家在帝國／殖民主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¹⁶ 故而，薩氏《東方主義》論證的是西方男性的「我們」(We)，以東方女性意象，再現東方／男性的「他們」(them)。「女人」是符號，絕非「說話的主體」(speaking subject)。至此，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既充滿性別化的迷思亦忽視相當數目的女性藝術家援引帝國修辭、參與東方主義建構的事實。¹⁷ 誠然，西方女性在面對其創作的性別弱勢時，即以東

16 關於女遊書寫和殖民主義的關連，詳見 Sara Millsn (1993)。

方主義鞏固己身的論述位置，以女性他者（female Other）凌駕種族（東方）他者（Oriental Other），以東方（男人）為其凝視的客體，重寫異他性（re-inscribe the otherness），以挑戰父系文化對女性書寫的圍堵——西方女性以種族優勢重寫性別劣勢。

西方女性援引／挪用帝國主義東方論述的精神，建構其書寫的主體（female writing subject），將女性寫入西方文化帝國的歷史（female inscription of the colonial history），芭哈絲的自傳小說《情人》（*The Lover; L'Amant*）就是這樣的作品。十五歲半的法國女孩，為了改變現實困境，和多金的中國情人，發生第一次性經驗。情人沒有名字，¹⁸ 並且沈默陰柔，通篇以小女孩（la petite）的凝視重現中國男人：

肌膚細緻柔嫩。這個身體呀！削瘦無力，沒有肌肉，像生過病正在療養似的。他沒有體毛，除了性器外，看起來不像男人。虛弱得如同承受著屈辱。（1985: 42）

17 參見 Reina Lewis（1996）。Lewis 希望由女性文本中，找到不同於男性「東方主義」的建構模式，強調東方在女性文本中是「可敬」、「熟稔如家庭」（respectable and domestic）的空間，如 Henriette Browne 所呈現者是（1996: 237），卻不意發現更多的女性藝術無法以此模式規範其呈現的東方主義，因此歸結女性東方主義是開放、流動、甚而自相矛盾的論述體系（1996: 238）。雖然露氏的討論侷限在 George Eliot 和 Henriette Browne 兩人，這樣的結論足以打破帝國主體統整（unity of the imperial subject）的迷思。關於其他探討女性參與帝國主義的論著，參考 Lewis〈緒論〉註2，p.10。

18 芭哈絲作品中的東方男人常無名無姓，《廣島之戀》中，法國女演員以「廣島」稱其日本戀人。

本段文字神似前述選自福樓拜的引文，唯獨埃及藝妓已被置換為中國情人。陰柔的中國人是女孩慾望的客體，在法屬的印度支那，小女孩以殖民主的優勢據用傳統男性凝視的位置，反轉性／性別的階級為女尊（強）男卑（弱），以馴化的眼／我（eye/I）主導情慾。女孩處處主動，蓄意等待獵物，借助裝扮，儲備引誘能量（蔡淑玲，1999: 136）：

我身著本屬於我媽媽的絲質洋裝，無袖低領，但舊得幾乎透明，……身繫著不曉得是那個哥哥的皮帶，……這一天我特意穿上這雙鑲金的高跟鞋，……就在晚間踩著鑲金綴珠花的鞋去上學……。但不是鞋子而是女孩頭上戴的男用寬邊帽，讓她看起來奇特，是一頂泛紅棕又繫著寬黑絲帶的帽子。意象之模糊就在這頂帽子上。（1985: 15-16）

借助扮裝，凸顯情慾，挑戰處女禁忌，以一頂男用帽模糊性別界線，區隔自我與其他殖民地的婦女：「此間殖民地，沒有女人如此裝扮」（1985: 16）。帽子使她由女變男，從而扮演情慾主體，挑戰生物的宿命（Biology is *not* destiny）：「突然間，我看到另一個自我，脫逃了天然的宿命，在城市間，旅程間和慾望間流轉」（1985: 16）。

莒哈絲操弄表象／真實，扮飾（符號）／意涵，服裝／身體，男性／女性等二元對立下的文化偽裝，逆轉性別／權力的關係。如果前述女孩的「凝視」再現刻板「陰柔」的東方男子形象，是東方主義知識／權力霸權的體現，則女孩含混性別、充滿情慾挑逗的扮

裝，更強化了跨國戀情中種族／權力的東方主義式操作。莒哈絲藉強化種族宰制，以顛覆性別宰制，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不再是平行排比的宰制體系（西方宰制東方；男人宰制女人）：在莒哈絲作品中，西方女人宰制東方男人。這種的詮釋或許太過單純，身在殖民地的西方女人，實則面臨自我分裂（split）的危機，小說中以「我」和「她」兩個代名詞交替使用，成年的作家主人翁更以「小女孩」（la petite）指涉十五歲半的自我。在前引的扮裝文字中，提及洋裝、皮帶、高跟鞋，皆以「我」指稱，但述及男用寬邊帽，則以「女孩」／「她」置換前段的「我」，彷彿是為隱藏主人翁性別僭越的焦慮。甚者，以白人的眼光來看，女孩直是「臭婊子」，「日日夜夜讓那骯髒的中國富豪摟抱身體」（1985: 94）。這種種族歧視的陳腔濫調卻是牢不可破的種族宰制。種族的差異和區隔，一直是小說的基調：中國人「如癩皮狗、如乞丐，……喧嘩的噪音是歐洲人無法想像的」（1985: 50-51）；「在我大哥面前，他不再是我的情人」，只因他是中國人，「他那羸弱的身軀，使我羞愧」（1985: 56-57）。中國人等同於狗的帝國修辭旨在區隔西方人和中國人：以中國人為「非我」（non-self）因而「非人」（non-human）的邏輯，運用「狗」、「乞丐」為辨識種族差異的符碼，行殖民宰制之實。因此，白人用餐就必須選擇「歐洲人專用的那層」（1985: 51），隔絕「種族污染」，保留歐洲人純淨的「白」。

然而，弔詭的是，西方女孩情慾及自我的解放，就在進入中國情人位於鬧街暗室的那一刻啟動：

閉上眼，我盡情享受激情，我想，他此生就為愛，沒有其他的了。他的撫觸完美至極，做愛好比是他的專業。

（1985: 46）

鬧市吵雜……好比行人從這斗室裡穿越，我在吵雜聲中，愛撫著他的身體。浩瀚如洋的情慾奔騰如潮起、潮落、又潮起。（1985: 47）

此處印證薩伊德所言，東方和性是密不可分的（1978: 188）。女性化（遭閹割）的中國情人在情慾流轉中如同超級陽具。¹⁹ 情人不曾擁有陽具（have the phallus），卻是不折不扣的陽具（be the phallus）。易言之，情人是異國情調的物神（exotic fetish），是女孩慾求之物，是女孩渴求的權力符碼（signifier of power），女孩以種族優勢重寫性別劣勢，以定義種族自我（racial self），滌淨其本具的性別異他性（sexual otherness）；而情人被慾求（desired）而未主動慾求（desiring）。既以中國情人為情慾的符碼，莒哈絲在處理女孩另一段同性戀情愫時，便將女孩的同性戀人海倫（Hélène Lagonelle）中國／東方化：

她和永隆的情人血肉同軀，她是帶給我深邃激情的農奴
〔中國人〕之屬，她是永隆模糊的身影，來自中國。海倫

19 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即以超級陽具定義黑人的男性特質（1967: 188），卻也必須提及黑人被女性化（閹割）的事實—因為「黑人不是男人」（1967: 7）。

拉孔蘭來自中國。(1985: 79)

中國非關真實地理（海倫來自法國），而是象徵主人翁同性戀性幻想的私密空間（Chester, 1992: 447）。套用巴巴（Homi Bhabha）的話，這種將情慾異域化的再現，²⁰是西方人以東方主義刻板印象「投射」潛意識情慾的做法（1983: 27）。

小說始於「渡河」（擺渡湄公河）—進入東方神秘的異域，而終於「越洋」—回歸祖國以脫離情人，異域戀情是該被拋諸腦後的過去：沒有照片佐證，²¹如同「生命的故事不存在。沒有中心。沒有軌跡」（1985: 11）；「沒有淚水，因為他是中國人，不該為那種情人哭泣」（1985: 117）。然而，成年的主人翁，對寫作的堅持（母親認為寫作是幼稚的事），以捕捉逝去的年輕片段為其書寫素材。「那個無法表達的本質」（1985: 14），其實就是十五歲半的情慾：「一個我唯一所愛的影像」（1985: 7）。對莒哈絲而言，這個影像的可貴即在其「沒有被記錄下來，再現的是絕對，是絕對的創造」（1985: 14）。現實寧被遺忘／省略。情慾的重新探索／再現，是為成就女性的寫作主體（female writing subject）。「異域情慾化、東方女性化以及再現一成不變的東方本質」皆為莒哈絲以東方主義式的凝視建構女性主體的書寫策略（Chester, 1992: 446）。而書寫即是心靈創傷療癒的開始。²²

20 在描述對小哥的迷戀時，莒哈絲將小哥的身體比擬成印度的苦力（1985: 77），是情慾東方化的另一例證。

21 影像如何再現／創造殖民事實，容後再敘。

22 關於書寫和療癒的主題，參見 Glassman（1991）。

桑塔格的〈中國之旅〉(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一樣始於渡河(「我將越過香港與中國間的深圳河」,1991:3),一樣是書寫,一樣是段自我療癒的旅程,一樣深入神秘的異域:

中國食物、中國式洗衣、中國苦難。

對外國人而言,中國的確太大,難以捉摸。

我暫不深究中國革命的意涵,卻想理解中國「忍耐」的意義。²³

還有殘酷,中國忍受西方無止盡的假設。一八六〇年率領英法聯軍侵佔北京而受勳的軍官,遠航返歐洲時可能滿載成箱的中國珍品,期待有朝一日再以西方鑑賞家的身份重返中國。

—頤和園,雨果(Victor Hugo)所稱「亞洲大教堂」,遭洗劫焚毀。

—中國花園

……

中國食物。

中國苦難。

中國禮節。

英殖界……瘦弱的苦力吸著鴉片,拉著黃包車……拳匪之

23 筆者於美國念書時,曾有日本同學廣子問到為何中國經歷如此多的苦難,為外國凌辱,土地一塊塊割讓,卻又無動於衷,外國的殖民勢力對中國而言,好比是蚊子叮上了大象的粗腿。桑氏之言和廣子之間,有同樣的意涵。

亂……。（1991: 10-13）

一幕幕再現的影像，無異是以東方主義式的修辭拼貼中國的面貌。桑氏意在批判殖民主義的殘酷，卻必須借用帝國修辭以完成其中國想像。〈中國之旅〉不是旅行的文字記錄（遊記），而是桑氏中國行前的計畫書：「我要在行前完成旅行書」（1991: 32）。如果《情人》是對遺忘的過去再現／虛構，則〈中國之旅〉是對未踏上的土地的想像，兩者同樣非關現實。

桑氏對殖民主義的中國想像似乎了然於心：「中國是殖民搜括所得，是物質（objects），是空缺（absence）」（1991: 13）。中國的空缺即緣於中國其實是西方的凝視／想像／假設下再現的異域。桑氏以一張百科全書上的照片詮釋殖民帝國的凝視：

照片醒目處是一排身首異處的中國人屍體：頭顱滾出身外一段距離，不知那個屍身配上那個頭顱。七個白人站在屍體後，擺好姿勢，其中兩人戴著獵帽。不遠處幾個舢舨，左邊是村莊，背景的山頭覆著白雪。這夥人微笑著。無疑地，是同夥的第八個白人為他們拍照。（1991: 14）

第八個白人的「眼」強烈暗示帝國的凝視，相片是勝利的佐證，身首異處的中國人是擄獲的「獵物」。桑氏將攝影比擬為帝國之掠奪，被攝者的影像彷彿是拍攝者的戰利品。²⁴ 景物的排比象徵殖民西方

24 關於攝影所涉及的慾望與權力的論述，參見桑氏另著 *On Photography*。

人的統馭，經由相機再現成一個典範。地點在中國洪湖，時間是一八九九年，進入二十世紀前最後一個寒冷的冬天，殖民年代的中國。

桑氏再現帝國語彙／凝視其實是為暴露西方人的誤區／盲區。桑氏對中國充滿同情，而〈中國之旅〉通篇也滿溢她的迷惘和恐懼，她將自己的家族史和中國的苦難交織比對，以了解中國來了解自己。中國其實是符號／象徵，是桑氏心靈深處的壓抑空間（repressive space）。

早在三十年代，桑氏父母長居中國，在茫茫戈壁、巍峨紫禁城和燈紅酒綠的上海租界，都留下足跡；桑氏的生命在中國孕育（1991: 12）。一九三三年，母親返美生下桑氏又回中國；五歲時，父親病逝中國。「回到」中國（桑氏曾謊稱中國為其出生地），彷彿是朝聖（1991: 12），為尋覓成長過程中心創鬱結（traumatic fixation）的根源，為尋覓缺席的父親。桑氏比喻中國之旅為「神話之旅」：「進入歷史外的區域，進入地獄、冥府」（1991: 27）。中國之旅如同神話中奧德賽（Odysseus）、阿尼亞斯（Aeneas）和但丁（Dante）的地府行，為會先人／先知／父親，以了解死亡為何：「我造訪父親的死亡」（1991: 19）；「是誰的聲音說著要去中國？是個不到六歲的小孩的聲音」（1991: 7）。如同心理學上所稱的「退轉」（regression），回歸童年經驗，桑氏始得重新省視受壓抑的潛意識心創；在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中造訪慾望（desire）；在慾望書寫中，再現中國為後設的神話／迷思（myth）。桑氏稱中國為「最富異國情調的異域」（1991: 18），也以完全相同的辭彙指涉「心靈」（1991: 23），中國等同心靈，其實是以異域出離現實，回歸潛意識，和不復記憶的過去建立聯繫。如

此一來，桑氏之作明為書寫未來，其實如同芭哈絲般也是想像過去。

「中國」是女作家以書寫為自我療癒的媒介——一個用以投射／貯藏潛意識焦慮、恐懼和慾望的想像地理。因此，桑氏向下向深處挖掘，如同她曾在後院掘出個「六呎見方的洞……希望一路掘往中國」（1991: 8）。

「中國」是桑氏外於歷史／時空的心靈靜謐的空間（Sayres, 1990: 49）。如同薩伊德所言，「想像的東方不僅是帝國的現實，其邏輯也受慾望、壓抑和投射等心理過程所支配」（1978: 8）。或以桑氏自己的話語來說，中國則是「女人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1973: 184-85）：第三世界／中國所受的帝國宰制適足以類比女人特別是女作家受壓抑的苦難。²⁵ 中國因而是個隱喻／轉喻，象徵（西方）女人受壓抑的心靈，而觀測／想像「中國」的「中心」是西方女人；桑氏重述中國用以定義地理方位的詞彙——東青龍、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方位中心的空缺則以「自我」填補：「我願在中心」（1991: 10）。西方女作家霸據「中國」的「中心」為自己的論述位置。情慾的中國是西方女作家作為心靈投射的異域，是東方「典型」的操作運用。但不同於男性植根於政治對立的東方主義，西方女性的東方想像較為流動、私密，屬於內向的心靈觀照。

25 同樣的類比也出現在修瓦特（Elaine Showalter, 1993）文中，但修文通篇未提及任何第三世界的女性，第三世界形同隱喻，西方白人女性關懷的是「（西方）女人的第三世界」，而非「第三世界的女人」（third-world woman），史密斯（Barbara Smith）因此斥之為「偽裝的文化帝國主義」（"disguised cultural imperialism," 1993: 172）。

三、《金山勇士》(China Men)²⁶—湯亭亭的另類歷史：再論「典型」(stereotype)

湯亭亭的例子不同於上述兩位作家。湯氏文本深深植根於中國移民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情境，除個人心靈探索外，更有族群的關懷；其中涉及與主流文化的協商，再現與反轉東方主義的「典型」(represent and reverse the stereotypes)，乃重要議題。「典型」如上文論及，實是以區隔代替差異，以象徵畫清我們(主體)和他們(客體)(We/them)的界線，俾鞏固自我／統馭他者。然而，這樣的定義，似簡化「典型」所寓涵的權力運作的矛盾情結(ambivalence)。文化論者如巴巴和侯爾(Stuart Hall) 已指出「典型」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 乃「矛盾的文本」(ambivalent text, Bhabha, 1983: 17; Hall 1997: 263)。侯爾舉例論曰，西方之「黑人非男人」的想像其實是另一個沈重而擾人的幻想的掩飾：在西方人的想像中，黑人或許是超男人(擁有超級大陰莖)(1997: 263)。如此類比，則女性化的中國人典型如傅滿洲、陳查理者，實寓涵西方人另一層反面的幻想：中國人實為陽剛、具攻擊

26 湯亭亭稱《金山勇士》為父親書，和《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的母親書，合為家族書(Kingston, 1983a: 563)。為免兩書合併篇幅冗長且相干擾(Robinowitz, 1987: 179)，故將父祖的故事獨立成冊，是為《金山勇士》。湯氏原屬意英文書名 *Gold Mountain Heroes*，但以出版社建議而更名 *China Men*。至於 *China Men* 之中譯，或為「中國男子」或為「杜鵑休向耳邊啼」，而中文書名《金山勇士》則是作者的選擇，封頁內每章節前，皆配有一方「金山勇士」的印章，頗有以銘刻為表彰、讚頌之意(Li, 1990: 484)。參見單德興，2000a: 128-29，註3。

慾，其能力足以構築黃色帝國，故有「黃禍」一說。因此，在反轉典型的策略運用上，即有奧妙之處，如果以重塑中國人陽剛形象以修正「中國人非男人」的想像，或將落入西方刻板印象矛盾的謬誤，延續永無止境的文本／性／種族暴力（textual/sexual/racial violence）。趙健秀以《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英雄好漢為中國人重振男性雄風，導正西方刻板印象，呈現歷史道地真實（authenticity），²⁷固有其國族主義的考量，卻需謹慎以免落入二元對立的迷思，或套用胡克斯（bell hooks）的話，中國人的英勇武侯的形象或只淪為「商業文化體制下族裔的香料，為單調無味的主流白人文化添味加料」（1991: 21）。²⁸ 其中的文化差異和「歷史真實」不但被刻意淡化且被收編為美國倡導「多元文化」的一個代碼。在再現華裔傳統和探索文化認同的議題上，湯亭亭顯然採用了相當不同於趙健秀的書寫策略。²⁹ 李磊偉（David Leiwei Li）在論及華美作家職志時，提及華美作家「肩負雙重重擔，既要顛覆美國東方論述的文化壓迫，更需重建代表族裔解放的華美傳統」（1992: 323）。李氏在其近作《想像國家》（*Imagining the Nation*）中，詳述美國東方論述的根源及亞裔經典的文化抗爭（resistance），並且探討抗爭文學如何透過和主流文化的互動和協商，以權宜之計爭取發言權，

27 關於趙健秀的「真實道地」說，參見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1991）。侯爾的反轉典型論，詳見侯爾 272-75。

28 君不見 Bruce Li（李小龍）和 Jackie Cheng（成龍）在好萊塢電影中的龍種形象：勇猛善鬥。好萊塢電影裡的中國實是「臥虎藏龍」（"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的國度。

29 湯、趙論述策略之別，詳見 Elaine Kim（1982: 199）和單德興（2000: 157-80; 2000: 213-38）。

轉化邊陲的逆境 (Li, 1998)。書中並以湯亭亭為例，說明華美作品中，對東方主義想像 (Orientalist imagination) 的刻意挪用、包容甚而改寫，其實是利用美國文化對神秘東方和異國情調嚮往的心理情愫，以闖入美國正統／主流論述的權宜之計 (1998: 46)。因此，東方論述於湯亭亭作品中，不是「本質的情境」 (a condition of being) 而是「挪變的契機」 (an occasion of becoming) (1992: 329)。具體來說，華美作家轉化雙文化困境為契機的根結就在以記憶／紀念 (remembrance and commemoration)，尋找源頭 (location of origin)，並在與主流論述的文化協商中，重新想像故國，化解認同危機，同時提供具體族裔文本，創造另類歷史／文學，以填補主流歷史的空白和遺漏；易言之，即是為被消音的族裔文化爭回歷史 (claim history)。³⁰

李磊偉的《想像國家》(1997)因而和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 1991) 之論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國家／民族／社群既是虛構／想像，便有其重新建構／想像的開放空間。湯亭亭以西方「中國想像」為起點而書寫的「想像中國」的文本，提供相對於美國主流社會的另類敘事、記憶與歷史，達成「創始／創史」的文化使命 (單德興, 2000a: 210)。具體而言，湯氏以另類論述對抗／反轉西方中國想像的書寫策略，實則符合侯爾文化研究所述：一者以陽剛取代陰柔，顛覆並糾正刻板印象的謬誤；再者以陰柔為美，讚頌不為西方肯定的負面意象，

30 Gilroy 謂離散意識 (diasporic consciousness) 源於遺忘故國的危機，故而離散生活中，記憶顯得格外關鍵 (1997: 318)。關於湯亭亭的故國記憶，參見 Rabinowitz (1987)。

強調族裔文化的差異；末為由內質疑（contest from within），暴露再現的複雜性，誇大西方刻板印象將異域性慾化的效果，以揭露西方焦慮、矛盾的心結（Hall, 1997: 272-75）。

湯亭亭是進入美國正統／典律文學的少數族裔作家之一。³¹ 但湯氏在定義自我時，明確指出厭棄帶連號（hyphenated）的表達方式，認為 Chinese-American 一詞將連號兩端的文化意涵等量齊觀，不符其自我認同的感受，應以去連號的 Chinese American 代之，Chinese 成為形容詞，American 為名詞，既肯定自己為美國人也兼顧父祖來自中國的歷史淵源（Kingston, 1982: 60）。湯氏定位自己為美國人，並坦承其寫作的目的即為華裔爭回美國（claim America）：「爭回美國非指同化於美國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而是一種向美國排華的種族主義和立法說不的回應；華裔不是外人（outsider）；我們屬於這裡，這裡有我們的歷史，而我們是美國的一部份；如果沒有我們的參與，美國即不為美國」（Kingston, 1983b: 16）。《金山勇士》即為湯亭亭為華裔父祖爭史的「發憤之作」（單德興，2000a: 149）。張敬珏（King-KoK Cheung）在討論本書時，指出父親思德的沈默是激發湯氏創作的動力；白人美國史規避中國佬的事實，促使她從零散的資料中，重新建構散失的族群佚事（1993a: 22）。湯氏四代父祖，經由女兒的史筆春秋創造另類歷史，爭回失落的歷史定位。

《金山勇士》全書分十八章，以家族中四代父祖美國奮鬥史為

31 關於湯亭亭的典律化，參見 Li (1998: 60) 以及 單德興 (2000a: 125-126)。

主軸，共佔其中主要的六章；其餘十二章中，除為首兩章類似中國傳統小說的楔子或入話，另十章附在每個章節後，為主章節注解收場，做為主章節的跋，也與主章形成多重文本互涉和對話關係。如此一來，六個主章形成看似完整的家族歷史線性敘事，穿插的十二章則使文本流動，形成非線性循環結合。

《金山勇士》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中，歸屬歷史類，但書中的歷史／神話／傳說雜陳，打破歷史／小說的文類界線，也因其線性／非線性並容，挑戰傳統歷史線性的敘述成規。

另類歷史的創見／舉，非僅於此。首章〈論發現〉更進一步改寫哥倫布美洲發現史。故事取自李汝珍《鏡花緣》，主角由林之洋變為唐敖。「唐」指唐人即中國人，「敖」有流浪、煎熬之意；時間比一四九二年早：發現之旅起點為五世紀（一說八世紀）的東方中國，改寫西方殖民史的源起。湯氏虛構地圖，以中國為中心：

烏龜、大象支撐大陸洲塊，小島亦在象和龜的背上；其他地理圖呈現洲陸為山巒，中國居中為中山，或稱漢山或唐山，或呼吳國，有金山在之西或之東。（1989: 47）

稱中國為中山，既將中國置於地理中心，也取登高遠眺的統馭優勢；³² 漢唐為中國盛世，吳則指東南沿海華僑故鄉；以中山／漢山／唐山／吳國稱中國，是中國中心論，金山／美國或在西或在東

32 美國女作家麥修（Maureen F. McHugh）的處女作《張中山》（*China Mountain Zhang*），主角雖以中山為名，卻是不折不扣女性化的科技產物，與中山原意相去甚遠，充滿殖民主義的東方想像。

皆為邊陲，湯氏的虛構地理，實為東方主義的反向操作。諷刺的是遭畫眉、纏足、挽面、穿耳洞的唐敖，彷彿再現東方主義的刻板印象，成為被宰制的他者。但以此形象指涉華工「沒有故事、沒有過去、沒有中國」（1989: 14）的沈默，以及其從事洗碗洗衣等傳統女性卑微工作的困境，適得其喻（Goellnight, 1992: 192）。而以其女性形象，如遭閹割去勢，益突顯華人移民異土，無妻無性無力綿延後代的煎熬，此項主題在〈鬼妻〉、〈羅賓漢漂流記〉等章的參照互讀下，更加明顯。

湯氏由兒時母親口述的羅賓漢故事譯回英文，以中國佛教的十八「羅」漢，隱喻「羅」賓漢，稱之為「勞動、無性的驢子」（1989: 226），又以荷馬史詩《奧德賽》所到的蓮花島為羅漢居處，暗指中國男人移民海外，遺忘來時路，沈溺於幻境的悲哀。東方主義的「中國想像」再現為「想像中國」的詞彙，據用帝國措詞適足以指明反宰制的控訴，為沈默的父祖發聲。而發聲的意象，在伯公一章最為明確。伯公發明「大吼會」，掘地洞，將胸中的壓抑的鬱悶一吐為快，將真言還諸大地。

相對於《女戰士》中的木蘭女變男，《金山勇士》刻畫反向的男變女。唐敖和杜子春是古典的例子，現實生活中，中國男人洗衣工的形象，和《鬼妻》中書生刺繡，並無異趣。中國男人象徵性被去勢，淪為女奴，其男子氣概在異鄉無性的生活中，消失殆盡。這一個女性化的形象卻在內華達山阿公射精的故事中得以反轉（reverse the stereotype）：

一日陽光美好，阿公不是想小便，而是想射精，……他捲

成一團，為美景和恐懼所攝，一股氣衝進陰莖……他突然直起身來，將精液濺射向空中。此後，常與世界（大地）做愛，世界的陰道如天空浩瀚，如河谷廣闊。（1989: 133）

湯亭亭以極度陽剛意象肯定華人男性生理，透露性慾和壓抑相長的聯繫，反轉刻板印象，揭示西方恐懼東方男性雄風的矛盾心結，粉碎華美男人羸弱形象。將新大陸的土地女性化／他者化，充滿金山勇士開疆闢土征服處女地的想像，又是東方主義反向操作的另一例證。

《金山勇士》出書之始，湯氏原以 Gold Mountain Heroes 命名，為出版社建議而更名為 China Men。China Men 為 Chinamen 支那人的變形，不刻意抹去主流文化／語言對華人歷史性的侮蔑，也從華美文化角度重新思考，使「支那人」一詞成為再現「種族現實一個驕傲的象徵」（Li, 1990: 484）。雖名為《China Men》，但 Gold Mountain Heroes 以中文書名《金山勇士》出現在書的內標題頁，並鑲在一方陰刻的中國印裡，印璽是中國「名」的象徵，中國男人在印的背書下，成為金山勇士，好似一個鎖住（seal）的秘密以印（seal）的權威來表達。標題頁陰刻的印，在每一主章節標題頁上，又被置換成陽刻的印，由陰而陽，是名的更加肯定，光明正大。女性化的中國男人蛻變為金山勇士。由女而男，由中土而金山（金山在美國，在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是湯亭亭挪用東方主義而又反轉刻板印象的書寫策略。是故，其另類歷史實為和主流論述互動協商後再現／再造的傳統：《金山勇士》進入美國典律，其來有自，

化挪用為挪變，正足以補正史之不足。書中章名由〈來自中國的父親〉，歷經墾荒築路，到轉化置換為〈美國的父親〉，父親古典「思德」的名字，也改為洋化的 Edison，為父祖正名為美國人的歷史企圖心，可見一斑。湯氏稱「金山勇士是建設美國，凝聚美國的祖先」（1989: 146）。將中國邊緣人的角色，修正為史冊上的開國英雄，正是主流和另類歷史文化協商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勇士是英雄，但「勇」（heroism）卻不是傳統定義的英勇，而是表現在中國男人身上陰鬱、柔韌、堅忍的原始女性特質，無怪乎張敬珏謂湯氏具有「女性主義和族群的雙重感知」（Cheung, 1993b: 125）。湯氏一石兩鳥，既掙脫性別的樊籠，也改寫了東方主義刻板印象的定義，暴露刻板印象的矛盾和謬誤，爭得認同的歷史。如果批評家對湯氏的文化認知質疑，批判其文化誤讀，那麼反誤讀的策略，就在跨疆越界，找到跨文化更多的聯繫。³³

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 1986）在〈三個女性文本與帝國主義批評〉（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關切西方帝國女性主義作品徹底否定「他者」女人在文本與現實中的存在，嚴正控訴在帝國主義操控下白人女性的主體是建構在相對於被殖民本土女性的種族優勢上。而身為研究西方女性書寫的東方女子，筆者關懷的是，東方作為一個符號、一種想像，如何造就西方女作家寫作主體的建構，成就西方女作家的志業。莒哈絲、桑塔格和湯亭亭的東方想像各有不同的淵源、表達方式和意旨。湯亭亭尤其不同於其他兩位西方作家，湯氏以少數族裔女性的角色，再現

33 參照湯亭亭的 Cultural Mis-readings (1982)。

／據用優勢的東方主義修辭，跨越種族／性別的界線，在權宜中得到主流文化的認同，闖入典律，得為從屬階級發聲。中國男人的刻板印象只留在古老傳說的記憶裡（比如唐敖畫眉纏足為女人的故事），現實中的中國男人，雖亦陰柔，湯氏名為「金山勇士」。

「金山」一詞催化空間的轉移，「東方的他者」（Oriental Other）自此被去異化（de-alienation），成為主流文化／歷史的一部份。湯氏在西方發聲，重新定義祖源的中國，藉由為中國男人正名為金山勇士，以陰柔為美、陰柔為勇，不但質疑東方主義本質的矛盾，更以春秋史筆成就創作大業。薩伊德《東方主義》中的「東」與「西」、《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的「主流」與「另類」所呈現的二元對立，顯得過份簡化。

數百年來，國家神話、對立的政治格鬥所招致的衝突和戰爭罄竹難書，國族／東方／西方……主義既是虛構，湯亭亭的女性創始／史書寫超越東方想像的囿限，建立多元文化的理解，進而跳出狹隘的民族歷史框架，或將給予二十一世紀後族國時代重要的啟示。

參考文獻

- 史景遷 (2000) 《大汗之國》。阮叔梅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 李敦白 (2000)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林瑞唐譯。台北：智庫文化。
- 單德興 (2000a) 《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出版。
- 單德興 (2000b) 〈理論之旅行／翻譯：以中文再現 Edward W. Said：以 Orientalism 的四種中譯為例〉，《中外文學》，29(5): 39-72。
- 張小虹 (1995) 〈東方服飾：蝴蝶君中的文化／性慾／劇場含混〉，《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138-60。台北：聯合文學。
- 劉紀蕙編 (2000) 〈西方的想像〉，《中外文學》，29(2): 99-189。
- 蔡淑玲 (1999) 〈莒哈絲時空異質的影像書寫〉，《中外文學》，27(9): 128-151。
- 鍾叔河編 (1985) 《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出版。
- Anderson, Benedict R. O'Gorman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habha, Homi K. (1983) The other question: The stereotype and colonial discourse. *Screen*, 24(6): 18-36.
- Brandy, Pam and Kyle McCulloch (2000) Mr. Wong[online]. Available: http://icebox.com/show/show_54/showpage.asp
- Chester, Suzanne (1992) Writing the subject: Exoticism/Eroticism in Marguerite Duras's *The Lover* and *The Sea Wall*. In Sidonie Smith and Julia Watson (Eds.), *De/colonizing the subject* (pp. 436-45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eung, King-Kok (1990) The woman warrior versus the Chinaman Pacific: Must a Chinese American critic choose between feminism and heroism? In Marianne Hirsch and Evelyn Fox Keller (Eds.), *Conflicts in feminism* (pp.234-251). New York: Routledge.
- Cheung, King-Kok (1993a) Talk-Story: Counter-Memor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Tamkang review*, 24.(1): 21-37.
- Cheung, King-Kok (1993b) *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m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Logaw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ien, Xiao-mei (1995)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n, Frank, et al. (Eds.) (1983) *AIIEEEEE!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Boston: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Chin, Frank (1991)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In Frank Chin, et al. (Eds), *The Big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writers* (pp.94-110). New York: Penguin.
- Duras, Marguerite (1985) *The lover (L'Amant)*, Barbara Bray (Trans.). London: Famingo.
-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Charles Lam Markman (Trans.). New York: Grove.
- Gilroy, Paul (1997) Dia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299-346). London: Sage.
- Glassman, Deborah N. (1991) *Marguerite Duras: Fascinating vision and narrative cure*.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 Goellnicht, Donald C. (1992) Tang Ao in America: Male subject positions in China

- Men. In Shirley Geok-Lin Lim and Amy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pp.191-21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97)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 Hastings, Tom (1992) Said's *Oriental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hetero)sexuality,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3(1): 127-148.
- hooks, bell (1991) *Black looks: Race &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Kim, Elaine H. (198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ingston, Maxine Hong (1982)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In Guy Amirthanayagam (Ed.), *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pp.55-65). London: Macmillan.
- Kingston, Maxine Hong (1983a) Imagined life,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2: 561-570.
- Kingston, Maxine Hong (1983b) Maxine Hong Kingston: from an interview between Kingston and Arturo Islas. In Marilyn Yalom (Ed.), *Women writers of the West Coast*. Santa Barbara: Capra Press.
- Kingston, Maxine Hong (1989) *China men*. 1980. New York: Vintage.
- Koss, Nicholas (1999) *The best and fairest land: Images of China in Medieval Europe*. Taipei: Bookman.
- Lewis, Reina (1996) *Gendering Orientalism: Race,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 Li, David Leiwei (1990) *China men*: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the American canon, *ALH*, 3(2): 482-502.

- Li, David Leiwei (1992)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tradition: Displacing 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 In Shirley Geok-Lin Lim and Amy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pp.319-331).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i, David Leiwei (1998) *Imagining the nati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Lin, Mao-chu (1988)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Teachers' College*, 1: 79-118.
- McHugh, Maureen F. (1992) *China mountain Zhang*. New York: Tor Book.
- Mills, Sara (1993) *Discourse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Rabinowitz, Paula (1987)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6: 177-187.
- Rittenberg, Sidney, and Amanda Bennett (1995)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aid, Edward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id, Edward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New York: Vintage.
- Said, Edward (1986)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s.),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ory: Papers from the Essex conference, 1976-84* (pp.210-229). London: Methuen.
- Said, Edward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 Sayres, Sohnya. (1990) *Susan Sontag: The elegiac modernist*. London: Routledge.
- Showalter, Elaine (1993) A criticism of our own: Autonomy and 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In 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 Herndl (Eds.),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pp. 168-188).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Barbara (1993) 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In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pp.168-185). London: Virago Press.
- Sontag, Susan (1973)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Partisan review*, 40: 180-206.
- Sontag, Susan (1990)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ontag, Susan (1991) *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 I, etcetera*.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pence, Jonathan D. (1998)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6)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Henry Louis Gates,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262-28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he Orientalist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Women's Writings: (Mis) Representing China/Chinese Men in Marguerite Duras', Susan Sontag's,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s Works

Hsinya Hua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Orientalism, as (re)defined by Edward Said, refers to three overlapping domains: first, the chang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second, the scientific discipline in the West which studies the various Oriental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third, the ideological suppositions, images, and fantasies about a currently important and politically urgent region of the world called the Orient.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n these three aspects of Orientalism is the line that separates Occident from Orient, and this line, as Said argues, is less a fact of nature than it is a fact of human production, which Said calls "imaginative geography." Orientalism is a science of incorporation and inclusion by virtue of which the Orient is conceived and introduced to Europeans. The Orient is therefore not Europe's interlocutor, but its silent Other. Said's analogue to the Orient as the silent Other is the Victorian housewife: the Oriental, like the Victorian housewife, is confined to

silence and to unlimited enriching production. Orientalism is thus connected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sexual asymmetry underlying Western patriarchal culture. Orientalism is an exclusively male province, as Said contends, "since women are usually the creatures of a male power-fantas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rgue for a female imperial gaze and challenge the potentially unified, and paradigmatically male, colonial subject outlined in Said's *Orientalism* in 1978. Using Marguerite Duras' *L'Amant*, Susan Sontag's "The 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as (con)texts/contests, this paper analyzes Orientalist representations *by* women, instead of the Orientalist images *of* women as most cultural histories of imperialism did. I argue that women produce imperialist images and are themselves Orientalist subjects. The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of representations by women will then sugges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ideologies of race and gender in the (post)colonial discourse.

Key words: Orientalism,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s, China as sign, Chinese men as icon